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93期(民國105年9月),41-8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1924-1933
——一個組織史的考察*

陳耀煌**

摘　要

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曾是冷戰時期中外歷史學者關注的焦點。毛澤東與所謂三次左傾路線的鬥爭,曾經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然而,在冷戰退燒後,學者們逐漸失去了對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黨史的興趣。今天的歷史學者,除去從龐大的史料堆裡發掘那些尚未被人知曉的史實外,能否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去重新發現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呢?本文將透過新的組織史的視角,嘗試去找出此一時期中國共產革命在陝西省的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某些特質。

關鍵詞:中共黨史、組織史、陝西、土地革命時期、三次左傾路線

* 收稿日期:2016年5月2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6年9月8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　言

1980 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 1927 至 1937 年間即所謂土地革命時期的歷史受到西方史學界相當之重視。在冷戰的背景下，當時的西方學者急切地想要了解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尤其 1927 至 1937 年期間以毛澤東爲首的農村游擊隊領導人與瞿秋白、李立三以及王明，即中共官方黨史所謂三次左傾路線的中央領導人之間的鬥爭，反映了中國與蘇聯以及國際共產革命的分歧，引起學者極大的興趣。瞿秋白等左傾領導人被指摘只知盲目地聽從蘇聯的指示，執行終將證明徒勞的城市革命路線，毛澤東的農村革命路線則被讚許更切合中國的實際情形，兩者間的矛盾與對立及毛澤東的沉浮，也就成爲關注的焦點。兼之史料不足等原因，當時的研究大多僅局限在探討中共上層領導人之間的權力與路線之爭。[1]

1980 年以後，儘管相關的史料相繼問世，但是由於冷戰的結束，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黨史研究的熱潮逐漸退燒，西方學術界相關的出版品數量銳減。相反的，近十餘年來大陸地區相關的專書與論文卻不斷湧現，提供了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黨史相關的豐富訊息，只可惜大多數只限於敘述此一時期某一地區共產革命的發展經過，不免令人有意猶未盡之感；更不用說有許多還是由中共官方所編寫的地方黨史叢書了。[2]

1　關於此一時期西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介紹與評論，可見：Philip C. C. Huang, “The Jiangxi Period: A Comment o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in Philip C. C. Huang, Lynda Schaefer Bell, and Kathy Lemons Walker, eds.,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 1927-1934*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p. 83-97.

2　與本文研究有關者，如：康民、秦生，《西北高原起春雷——西北五四運動與大革命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陳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本論文嘗試利用當代中國大陸所出版的中共組織史資料，重新探究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3]從組織史的視角切入探討此一時期的革命史，是過去中外學者未曾做過的嘗試。但是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也只能以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作爲研究對象，兼與河北省和其他北方地區進行比較。時間的斷限則設定在1924 至 1933 年間，因爲 1924 年陝西地區成立了第一個中共組織，1933 年陝西省委遭到破獲，同時紅四方面軍於 1932 年底抵達陝南，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也從此邁入一個新的階段。透過組織史此一新的方法與視角，找出此一時期陝西地區共產革命中某些未曾被注意到的特點，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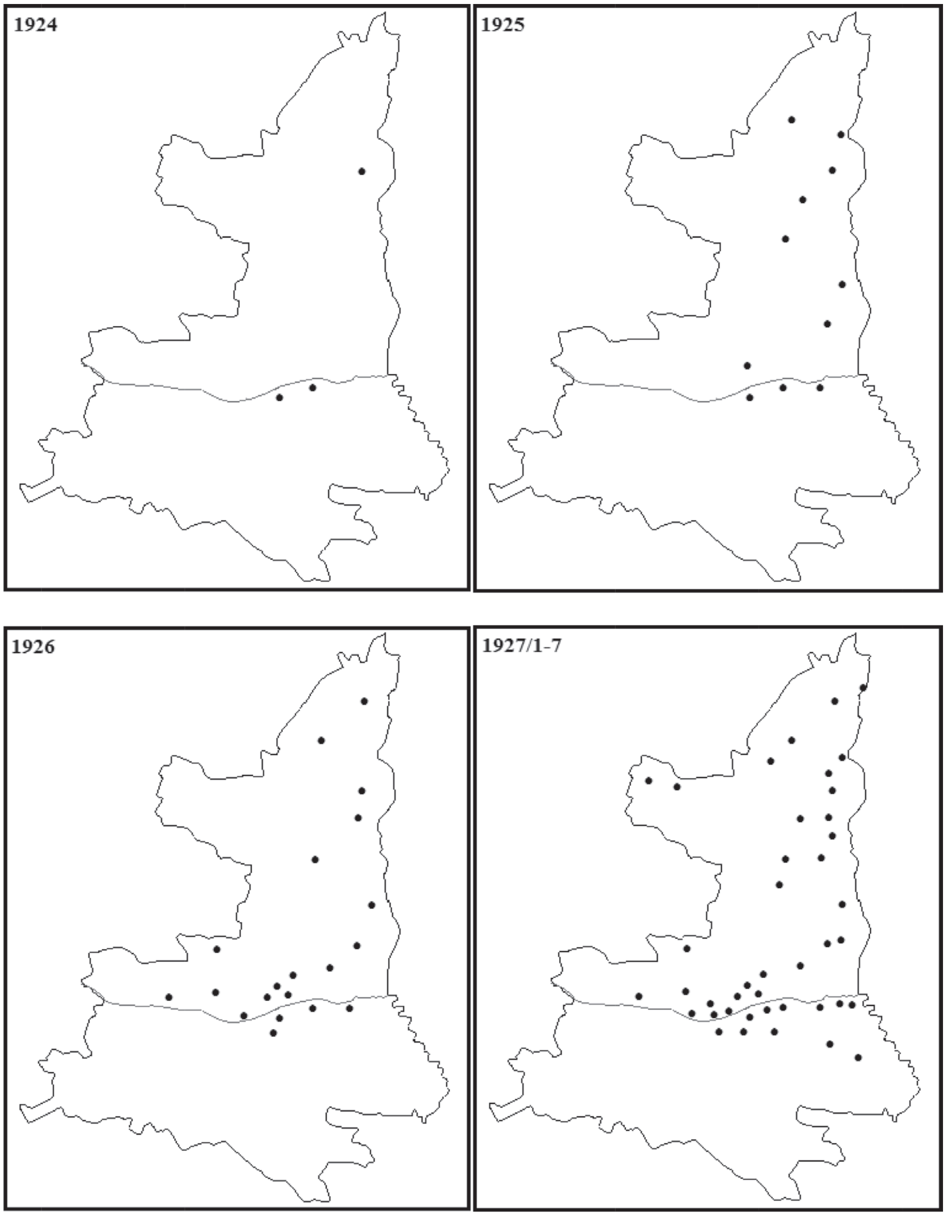
二、北伐前陝西地區中共組織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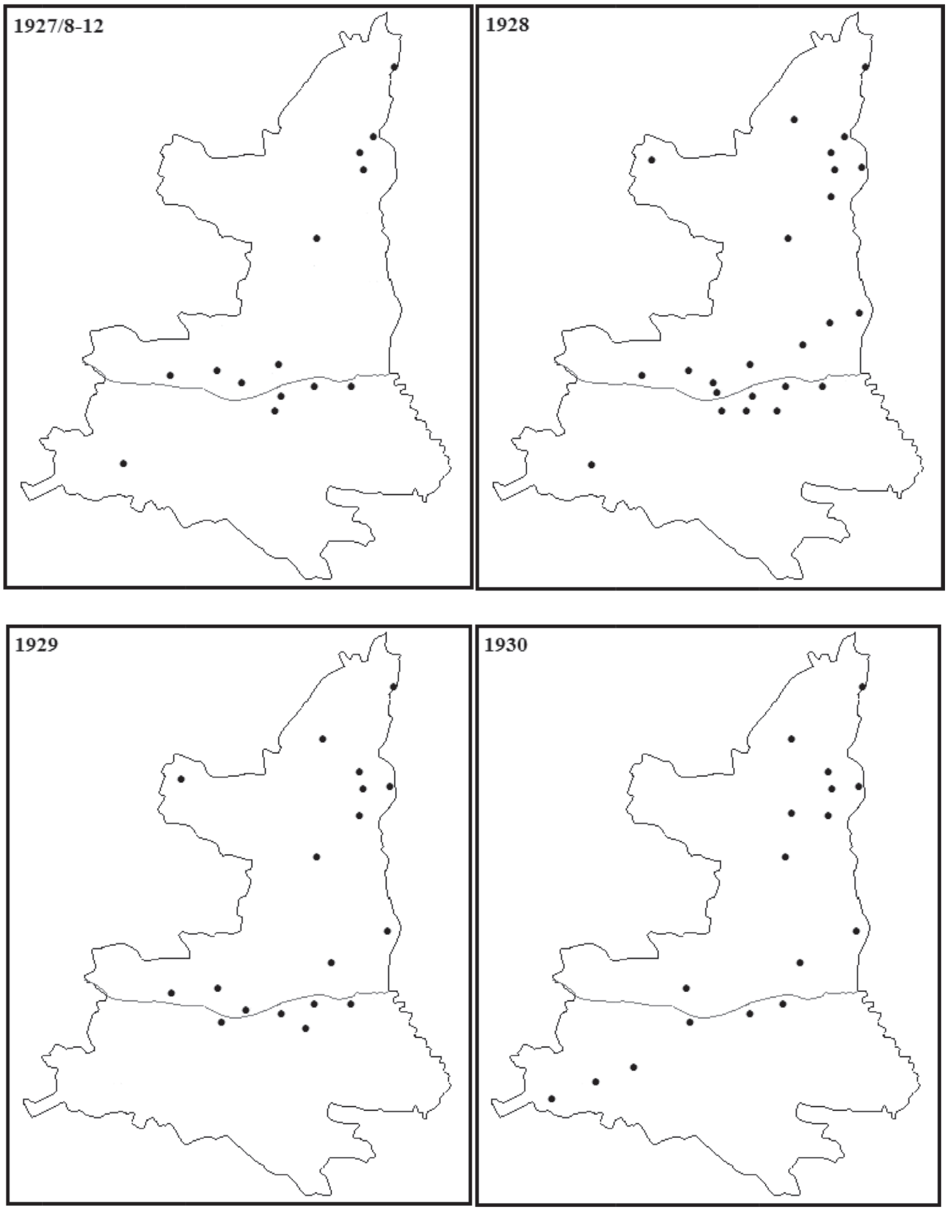
自從 1980 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出版了許多全國與各省、縣、市的中共組織史資料。本文以陝西地區作爲研究對象，故採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爲主要參考資料；[4]不足處再參考其他地區的組織史資料。爲方便分析起見，筆者首先將該書中所記載的 1934 年以前陝西地區中共組織的分布加以圖表化。圖一即是 1924 至 1934 年間陝西地區有中共黨、團組織成立的市、縣分布圖。

3 本文所指的中共組織，在第一次國共分裂以前，是包括黨、團組織在內。正如學者所指出，早期中共黨、團之間並沒有清楚的分別，甚至許多地區只有團的組織。直迄北伐前夕，中共中央仍抱怨「許多地方沒有黨的組織」，要求沒有黨組織地區的團組織代行黨的決議，陝西地區即是如此，1926 年第一個成立的最高陝西省級領導所以稱爲陝西黨團聯席會議即是一個證明。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39;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冊 2，頁 225。在第一次國共分裂以後，除特別註明者外，本文則是以黨的組織爲主要分析對象。

4 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陝西省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圖一　1924-1934 年陝西地區中共革命組織分布




1927/8-12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筆者還將《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中所記載此一時期的中共黨、團幹部做成一個陝西地區中共幹部個人資料表，記載幹部的籍貫、出身成分、活動年代、參加革命前後的經歷等。由於內容過於龐大，不便在此呈現，只能在論述中必要之處補充說明。又爲了與其他地區對照，也將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 1922-1987》及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第 1 卷的相關組織分布與幹部個人資料做成圖表。[5]但爲節省篇幅起見，同樣未將之呈現。上述的各種圖表即是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據。本文圖表的資料來源均同爲《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 1922-1987》及《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不另註出。

首先略述 1927 年以前北方地區各省的中共省級組織發展概況。1921 年 8 月中共在北京正式成立黨組織，負責推動與領導北京與周圍河北地區的革命活動，同時肩負領導北方其他地區的組織活動，此爲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正式起步。隨後幾年，山東等各省的組織也相繼建立。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第 1 卷記載，1927 年以前北方地區各省的中共省級領導幹部，主要是由知識分子出身的成員擔任。如 1921 年北京組織的主要領導全是北大師生出身，其中又以外省籍居多，特別是來自湖南等南方地區者。另外，早期北方地區的中共幹部有一個特點，即許多人都兼任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如張國燾、羅章龍等人，這也是同時期北方組織以工人運動爲重心的反映。1923 年經歷二七慘案的挫敗後，北方各省組織幹部的成分出現了兩個主要的轉變：第一是有更多在地知識分子的加入，如山東黨領導王翔千、延伯眞等人；第二是加入了許多具有留法勤工儉學與留蘇經驗的知識分子，他們在 1924 年後擔任北方各省重要領導的職務，如北京的趙世炎與陳喬年、山東的

5 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 1922-198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卷 1。

尹寬、河南的王若飛等人。這兩種轉變分別表示當時北方地區革命的兩個主要發展方向，一是向地方扎根，一是北方地區國共合作的開展，那些留法、留蘇幹部一個重要任務即是協助國民軍與蘇聯顧問溝通。而從 1924 年後各省的主要領導是由外來幹部擔任此一事實看來，與國民黨及國民軍的合作顯然更受到中共中央重視。

早期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也部份反映了上述同時期北方地區共產革命的特色。從圖一可見，早期陝西地區的組織是以關中的西安、渭南與陝北的綏德、榆林的學校爲中心向外擴散開來的。有一點與北京不同者，即早期陝西地區的組織活動是由歸鄉知識分子而非外省籍展開的。如關中地區最早的組織（也是陝西最早的組織）是渭南人王尚德武漢求學回鄉成立赤水職業學校後所建立的。陝北綏德人李子洲於 1923 年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陝西榆林中學任教，後任綏德省立四師的校長，榆林中學與綏德四師便成爲陝北地區的革命搖籃。省會西安早期組織的中心人物是魏野疇，他也是在北京讀書時加入組織，回鄉先後任教榆林中學、西安成德中學等學校，早期西安與周圍地區的許多幹部就是魏的學生。其他如三原的李秉乾、延安的陳俞廷與易厚庵，也都是歸陝的知識分子成員。

如同他省一般，早期陝西地區的組織也是透過李子洲、魏野疇等人的知識分子網絡向外傳播。所以早期各地組織的領導幹部，有的就是兩人的朋友，曾在外省求學，乃至於加入組織；如綏德的王懋廷、田伯英是李曾在北大就讀的朋友。但是大部份則是李、魏等人的學生，如西安的張性初、旬邑的許才升是成德中學學生；綏德的趙通儒與師應三、神木的賈拓夫是綏德四師的學生；榆林的張肇勤、延安的焦維熾、清澗的白作賓是榆林中學學生；渭南的劉映勝是赤水職業學校學生；三原的趙宗潤與孫一君、富平的嚴木三及岐山的李琦則是三原三師學生。早期陝西地區的組織主要就是透過這些知識分子的網絡散播的。

眾所周知，早期北京的組織是以北大的李大釗爲中心，吸收其友人與學生組成的。李大釗是經驗豐富的革命者，其學生則多是涉世未深的年輕學子，兩者之間不免存在著某種世代差異。如李大釗在上層社會交際廣泛，其學生張國燾、羅章龍等人卻瞧不起與官僚等上層人物的交往，而熱中於工人運動。陝西地區也存在著同樣的現象。根據 1927 年前西安、綏德、赤水 3 個地區中共組織幹部的分析，55 人中除去 12 位被上層派來的幹部外，有 8 人曾赴外省求學，其中 7 位是生於 1890 年代，包括李子洲、魏野疇、王尚德等人大多是各地組織的創始者，可以稱爲第一代革命者。這 55 人中至少有 23 人，是未曾出外求學即被李子洲等人吸收的年輕學子，屬於第二代革命者。另外身分不明的 12 人中 9 人屬於綏德組織，猜測也是在綏德四師時被吸收，所以估計有 32 位是屬於第二代革命者，當中除 1 人外，皆生於 1900 年後。所以，當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展開之際，第一代革命者大部份已達 25 歲，而如李子洲、王尚德甚至已經 30 歲了。至於第二代革命者，大部份都是學子，有的加入組織時，甚至不滿 20 歲，且絕大多數沒有赴外省的經驗。

如同北京般，陝西的革命者間也存在著世代差異。較年長的第一代革命者大多已就職，社會關係錯綜複雜。優點是善於利用社會關係推動革命活動，如李子洲、魏野疇就是透過陝西著名政治菁英杜斌丞的關係得以在綏德四師、榆林中學任教，但缺點也在易被外在社會環境所影響。年輕的第二代革命者則是充滿革命熱情，熱中於革命理論，缺點則過於單純，與社會缺乏互動，見識也不廣泛。這兩個世代革命者的優缺點互補，但也充滿張力。西安團在成立之初曾爆發第一與第二支部之爭，便部份地反映了革命者的世代之爭。根據現存一份 1925 年兩個支部的成員名單可見，第一支部的成員多是自外省求學歸來，並已就職者，如雷晉笙在教育廳做事，還有如河北人呂佑乾，1923 年北大畢業後到西安工作，後在雷晉笙介紹下入團。所以第一支部的成員比較類似前述的第一代革命者。至於第二支部除了其中心人物魏野疇屬於第一代革命者外，其餘大多爲年輕在學學生，也就是第二代革命者。這兩個支部間彼此不和，

第一支部有廣泛的關係，活動力較強，但也深受社會風氣影響，成員中還有吸鴉片與嫖妓者，因此爲第二支部的成員鄙視。蓋第二支部多是涉世未深的學生，對革命充滿熱情，也能夠掌握書本上的革命理論，卻近乎書呆子，缺乏活動能力，難以接近群眾，以致活動範圍多局限在學校周圍。[6]

早期陝西的組織是以年輕的第二代革命者居多，因此革命活動也局限在以學校爲主。例如，至遲 1925 年下半年起，陝北組織也開始提到要建立農民協會，但直到年底，仍舊哀嘆農民組織工作毫無進展。根據 1925 年團陝北綏德特支的統計，該團全數 75 人，其中 25 歲以上的 8 人，20 至 25 歲有 50 人，即大多數都是 1900 年後出生的第二代革命者；就出身成分來說，其中學生 55 人、農民 2 人、店員與其他 13 人、工人無，由此可見，該組織的活動是以學校爲主，甚少向學校外的群體發展。[7]

除了知識分子網絡外，軍事網絡也是早期陝西組織發展的一個媒介。所謂的軍事網絡，首先是指透過與軍事人物的關係所建構起的網絡：如李子洲便與陝北鎮守使井岳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8]魏野疇則是與陝西軍閥楊虎城交好，後來楊即一直與陝西共產黨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其次，有的革命者本身就是軍隊等武裝團體的成員，謝子長就是個例子。其 1895 年生，安定人，在榆林中學就讀期間受校長杜斌丞影響，棄學回安定擔任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教師。1920 年進入山西太原的陸軍學兵團，期間結識了同年生的陝西白水人李象九。1923 年謝氏從太原學兵團畢業回鄉舉辦民團，擔任團總。李象九也到安定投靠駐軍頭目石謙，因此當上安定縣警察局長。石謙也是白水人，是李表姐夫，土匪出身，後被井岳秀收編；後也透過李的關係，收編了謝的民團。1925

6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1-1994），甲冊 1，頁 70-71、75-81、83-84、115-116。

7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甲冊 1，頁 252、270、292。

8 前述幫助李子洲等人在綏德四師、榆林中學任職的杜斌丞，當時也被年輕的共青團員批評是陝北鎮守使井岳秀的走狗，曾拜曹錕爲義父等。這一點也間接證明前述革命者間的世代差異。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五年——一九三六年》，乙冊 1，頁 20。

年謝子長在赴北平期間加入了共進社與共產黨，回陝即在部隊裡建立了支部，安定與宜川最早的組織即是駐防該地石謙部的軍事特別支部。除了李象九外，中共後來還派了史唯然、杜衡（綏德四師畢業）等人到該部工作，幾乎掌握部隊，1927 年清澗暴動即是以該部爲主體發起的。[9]

謝子長的例子說明：陝西地區知識分子的網絡與軍事網絡往往重疊，原因即在於投身軍旅、地方民團、紅槍會乃至於土匪，均是陝西在地知識分子的出路。如魏野疇、呂佑乾，還有自上海歸來的劉含初，皆曾擔任楊虎城創辦的三民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或教官。再如華縣重要的革命據點高塘鎮，最初革命勢力的開展與民團也有關係。一位華縣成員陳述善，1923 年就讀北京朝陽大學並加入共進社及中共，隔年就因學費不濟，回鄉任教於高塘鎮谷堆小學，同時建立了組織。1925 年高塘爆發反抗軍隊的暴動，陳述善可能就是領導者。[10] 當時高塘有一位趙和民，在西安省立三中求學時，聞母被害，即飛奔回家欲持刀報仇；後來也在谷堆小學任教，並由陳述善介紹入黨，後擔任高塘民團的副團長。如同謝子長之例，華縣高塘鎮知識分子與軍事網絡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參閱同時期北方其他地區革命組織的發展，像陝西地區一樣知識分子與軍事網絡重疊的現象，並不多見，這或許也反映了同時期陝西等西北地區的社會動盪以及軍事化程度較高的情況。

總結而言，迄 1925 年止，陝西地區革命組織的發展，無論是透過知識分子抑或軍事的網絡，都帶有較強的地方性與自發性。就地方性來說，與前述北京組織比較下，陝西組織從一開始就是以在地出身的成員爲主，這主要是由於陝西地處偏僻，並非像北京般是全國性的大城市，也不像北京、天津、鄭州、濟南等地一樣，擁有鐵路等現代性的產業，所以不能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或產業工人，同時也不易受到以無產階級革命爲職志的中共中央之注視。也正是因爲如此，早期陝西地區的組織發展帶有較強的自發性，大部份的組織

9 劉風梅、王志厚，《謝子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 1-69。

10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甲冊 1，頁 35-38。

活動都是透過成員自身的關係，也就是知識分子或軍事網絡自發性地開展，很少是出於上層計劃與指示。這樣的自發性與地方性，既有其缺點也有其優點。缺點是這些性格使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從一開始就局限在省內，甚或成員所在的學校、民團或軍隊，缺乏與外省乃至本省其他地區的聯繫，也缺乏上層的領導與援助。但這些性格有一優勢，陝西組織比北方其他各省都更早轉向地方，像是回鄉擔任教師、民團團總，乃至於領導組織農民等。不像北京、天津、鄭州等城市般，因爲關注於全國性的鐵路產業運動，不注意扎根地方，以致一遇挫折（如二七慘案），就可能導致該地整個組織瓦解，而陝西或北方他省某些農村地區的組織卻能夠一直持續下去，儘管這些地區一開始並不受到重視。

三、北伐時期陝西地區中共組織的發展

1924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發足；隔年，以馮玉祥國民軍爲中心的北方地區國共合作也逐漸開展。伴隨著此一形勢，陝西地區的組織活動也發生了劇烈變化。

首先，1925 年以來中共中央與北京黨開始派遣幹部前來整頓與領導陝西的組織，如這年至陝的吳化之、安存真，1926 年的黃平萬、耿炳光、劉天章、韓慧芝、王泰吉，1927 年的陳家珍、曹趾仁、潘自力、孫玉如、孟芳洲，還有隨國民軍到陝西的劉繼曾、錢清泉、徐夢周等人。可見隨著北方地區國共合作的開展，中共派遣越來越多的幹部赴陝，這也意味著陝西的地位愈顯重要。並且上述 15 人中有 8 人是擔任陝西黨、團省級領導，包括 1926 年 12 月擔任陝西組織最高領導陝西黨團聯席會議書記黃平萬，1927 年 2 月接替聯席會議的中共陝甘區執行委員會（陝甘區委）書記耿炳光，還有團陝甘區委書記曹趾仁。可見當時中共中央想要直接掌握陝西組織的迫切性。

這些空降幹部的到來，爲陝西地區革命與組織活動帶來更多的外來因素，同時也意味著其躍上全國性的舞臺。過去活動主要局限在省內的陝西知識分子成員，也藉著國共合作與北伐戰事的開展，赴外省活動。如蒲城人亢心栽，三

原三師畢業，在三原入黨，1926 年赴北京中俄大學、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北伐開始後作爲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駐陝辦事員回陝，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等職。其他如寧強的王述績、綏德的李恩濤、渭南的李維屏、蒲城的魯振之等人，都曾赴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這些年輕知識分子成員不再是當日足不出省的青澀學子，有的如亢心栽般，已儼然成方面大員了。

有的則是趁國共合作之機報考黃埔軍校。著名者如保安出身的劉志丹，早年就讀榆林中學，後藉國共合作的契機，與同學一起報考黃埔。還有臨潼的王泰吉、華縣的陳述善與馬步雲也曾在黃埔學習。這些黃埔出身者對當時陝西地區革命運動的影響並不顯著，卻爲日後陝西組織儲備了重要的軍事幹部。還有一點值得注意者，過去陝籍知識分子多僅限於投入家鄉的武裝團體或本省的軍隊，國共合作與北伐戰事使其得以投身更廣大的軍事團體，開拓軍事網絡的聯繫。

這些外在因素，不僅刺激革命者向外拓展活動境界，也促進了省內革命與組織的發展。如圖一所示，1925 年陝西全省建立組織者僅 11 個縣市，至 1926 年底有 20 個，1927 年 7 月前暴增到 41 個。而且 1926 年新建立組織的 11 個縣市中，有 4 個建立於上半年，建於 8 月的 1 個，其餘皆是 9 月後。兼之這些新建組織的縣市，絕大多數位於關中地區。明顯的，1926 年下半年以來陝西地區組織的暴增，與北伐戰事息息相關。該年 7 月，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同年 9 月，馮玉祥的國民軍於五原誓師，欲南下經過關中，以圖河南中原。所以這個時期陝西地區的組織，主要正是爲了呼應北伐戰事與國民軍入陝，同時也在後者掩護下，如雨後春筍般倏地發展起來的。

國共合作與北伐戰事的開展雖然帶來新的外來因素，但此一時期陝西地區的革命與組織活動仍深受既存的地方因素的影響。

首先，就省級領導來看：事實上，自 1925 年開始，中共爲呼應北方地區國民革命的開展，派遣大量幹部到河南建立豫陝區委，作爲兩省的最高領導。且在 12 位豫陝區委委員中 7 位具有留俄經歷，是爲協助蘇聯顧問與國民軍溝通被派來河南，全都不是在地出身的幹部。在豫陝區委結束後，中共即分別成

立豫區區委與陝西黨團聯席會議管轄兩省的黨務，如黃平萬即曾在豫陝區委服務。但如表一所示，從豫陝區委、陝西黨團聯席會議到陝甘區委，陝西組織領導有在地化的趨勢。故與河南省級領導比較下，陝西的省級領導表現出更強的在地性。這主要是出於幾個原因：就外在因素看，河南地理上較接近主要戰區，同時擁有足以左右戰局的京漢與隴海鐵路，所以更受到重視，中共中央當然會派遣更多外來幹部到河南；事實上，豫陝區委的工作也是以河南為重心，區委成員都在河南，陝西並未受到重視。其次，就內在因素來看，豫陝區委成立前，河南地區的組織寥寥無幾，但陝西黨團聯席會議成立之際組織已有相當的基礎。如聯席會議與陝甘區委的委員中，魏野疇、雷晉笙、張性初、李子洲等人都是在陝西已有相當活動歷史的在地幹部。所以中共中央可以就地取材，不需要派遣太多外來幹部來陝西。

表一　國共合作時期豫、陝兩省中共省級領導籍貫比較

省　別	籍貫別	1925 年 10 月	1926 年 12 月	1927 年 2 月
河南省級領導	外來幹部	12	5	
	在地幹部		1	
陝西省級領導	外來幹部		2	1
	在地幹部		2	6

更重要的是，局勢的發展下，河南的地位越顯重要，陝西則日益被邊陲化。根據共產國際的檔案，國民軍在 1927 年初即有出兵河南的打算。同年 2 月，奉軍進軍河南，局勢變得更為緊張。原來中共中央已派遣許多外來幹部去河南從事鐵路等現代性產業工人運動，此時又派遣更多幹部動員紅槍會等農民運動，以響應北伐軍北上與奉軍決戰河南。當時陝西也有紅槍會等運動，但不如河南般受到重視，據國際代表報告，中共當時擬在河南召開包括豫、直、魯、蘇、皖五省的紅槍會代表大會，陝西並不包括在內。[11]甚至原在陝西任職的吳

1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卷 4，頁 59、240。

化之、安存眞等幹部在北伐還在進行中就被調離，這更證明陝西在當時並未如河南等地區般受到重視。

其次，再針對當時陝西省級以下的地方幹部分析：當時各地新的縣級組織，主要由在西安及周圍城市求學的知識分子所建立；如建立乾縣特支的張含輝、長安支部的陳嘉惠、旬邑特支的許才升、岐山特支的李琦、蒲城荊姚支部的萬志寧、禮泉特支的秋步月等人，而且許、李、萬、秋 4 人均是當地出身的回鄉知識分子。

當時陝西地區的組織除了橫向地從西安等主要城市向外縣擴散，還縱向地向底層農村發展。陝西底層農村的組織要到北伐戰事開始後，才突然大量地發展起來。據《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記載，1927 年國共分裂以前陝西地區縣級以下的農村支部，主要是分布在關中地區：如渭南有 24 個、三原 5 個、華縣 13 個、長安 18 個，另外涇陽、富平、大荔、武功各有 1 至 2 個；陝北的綏德、清澗、米脂、安定則只有 1 個農村支部而已。而且上述約 68 個農村支部中，只有 4 個成立於 1926 年 9 月以前。這說明：第一、關中地區由於戰亂頻仍，所以農民更容易起來響應革命；第二、這些農村組織的出現，主要是爲了聲援國民軍，因爲關中地區是其主要戰場與駐地。或者說，這些農村組織是在國民軍的掩護下才得以成立。反觀陝北綏德等地，由於不是主戰場，所以雖然也有不少的中共成員，但新建立的農村支部卻不多。[12]

新建立的農村組織幹部，知識分子出身者多是回鄉學子，有的即在該村莊中任教，如渭南王埝村、姚李村與隆興支部的裴延壽、薛應仲、王勉之、華縣鄭村支部的鄭雲章等人。較值得注意的是武功特支的吳德印，武功皇甫村人，平日在鄉行醫，在地方極有威望，是當地農民武裝團體「硬團」的首領，1926 年中共黨員張含輝介紹其入黨，目的不外是欲透過吳動員當地「硬團」聲援北伐。

---

12 中共當時也指示陝西的農運區域應集中，並配合政治，以渭河流域爲中心。其中長安、渭南、華縣、三原便是第一步發展的區域。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41。

如前述自 1926 年上半年迄 1927 年國共分裂前夕，陝西有組織的縣市暴增 26 個，總數達 41 個。可是其中只有 12 個縣市建立農村支部，這意味著很多縣市的組織活動，仍僅局限在縣城。雖然當時中共中央明令各地動員農民，聲援北伐，陝甘區委 2 月成立時，也明確提出「黨到農民中去」的口號。但是，從上述農村支部建立縣市的數量看來，大多數縣市的組織活動仍局限在縣城，沒有深入農村。這一點從新發展成員成分的分析也可以證明。根據統計，迄 1926 年底止陝西地區共有 388 名黨員，全為知識分子出身，沒有一個農民黨員；隔年 2 月陝甘區委成立，提出「黨到農民中去」的口號，全省黨員暴增到 2,177 名，其中農民 654 人佔 30%；知識分子 1,125 人佔 52%。共青團員原來也全是知識分子，但在 1927 年 3 月後的 4 個月內，團員也由 525 名暴增到 2,400 名，其中青農僅佔 20%弱。由此看來，知識分子依舊是此一時期陝西地區組織發展的主要對象。[13]

早期陝西地區組織的發展，如前述主要是透過成員個人關係，以知識分子或軍事方面的網絡自發性地發展；北伐時期亦是如此。此做法不可避免地把地方既存的派系鬥爭帶入革命陣營裡，如當時陝甘區委委員李子洲、魏野疇所屬的共進社便與另一個進化社互相衝突。共進社接近于右任，社員多係共產黨員；進化社接近岳維峻，成員多為反共分子。兩社的鬥爭既反映了地方既存的派系鬥爭，也反映了當時國共兩黨的緊張關係。當時中共上層並不打算利用共進社發展革命勢力，而是該社成員利用黨的名義「大坐其官」。而且許多社員也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而是出於「大共進」的立場工作。結果就是許多人只認識共進社，不認識共產黨。國共分裂後，中共陝西省委即指示不要加入共進社，要任憑其自生自滅。[14]由此即可看出成員透過既存的關係從事組織活動所帶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13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83、87。

14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50-53、64-65、83。

總結地說，北方地區的國共合作與北伐戰事給陝西組織活動帶來極大的外來影響，特別是中共中央領導的加強以及國民軍的到來。這些外來的政治、軍事力量，給予組織發展的動力與掩護，使得此時期陝西地區的組織一度出現爆炸性成長。但是此一迅速的成長缺乏穩定基礎；一旦國共分裂挪去這些外來因素後，如圖一所示，陝西的組織活動又回復原狀，有組織建立的縣市，從 1927 年上半年的 41 個遽減爲 14 個，相當於回到 1926 年上半年時的水準。

在人的方面，許多幹部在國共分裂後，也自願或被迫地離開組織，如前述武功「硬團」的吳德印在國共分裂後即脫離了組織。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所載北伐時期突然出現的大量農村支部幹部，絕大多數都找不到個人資料。這些人極可能是地方農民，或是如吳德印是地方武裝團體的領導或成員。陝西也有紅槍會等武裝團體運動，且與中共也有關係；但這些槍會群眾所以投身革命陣營，或是爲了自衛，或是爲地方謀利益，並不必然是出於對革命的信仰與認識。後來中共陝西省委也承認當時只是聯絡土匪與紅槍會，既沒有發動農民鬥爭，甚至當馮玉祥已經開始反共，也沒有提出反馮的口號。[15]因此國共分裂後，這些鄉間組織成員一遇壓迫就成群地脫離組織。如三原鄉間原有七十餘共青團成員，國共分裂後都找不到人了。[16]

失去外來的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庇護後，陝西組織回到過去般，依賴既存的關係網絡維繫活動。事實上，外來的政治與軍事力量雖然可以短暫地刺激組織的發展，但是在體制仍不完備下，組織的長久維繫仍需要依賴在地既存之關係網絡。而且即使在北伐時期，陝西地區的組織活動始終帶有較濃厚的在地性，如陝西省級幹部比河南等地更多是由在地出身者擔任即是個例子。正是這樣的在地性格，使得陝西革命運動在國共分裂前後，仍然能表現出相當的延續性。

15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105。

16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241。

表二　國共分裂後冀、豫、陝三省中共省委幹部身分、籍貫比較

				1927年8月	1927年9月	1928年1月	1928年7月	1929年4月
順直省委	身分	知識分子	工運	1	1	3	3	2
			農運			1	1	1
			軍隊				2	5
			其他	2	2	2	2	4
		工　人		1	2	3	3	5
		農　民				1		
		不　詳		1	1	3	3	8
	籍貫	本省籍			2	4	5	6
		外省籍		4	3	4	5	9
		不　詳		1	1	5	4	10
				1927年7月	1927年9月	1928年1月	1928年6月	1929年1月
陝西省委	身分	知識分子	工運	1		1		1
			農運	1	2	2		2
			軍隊	6	6	7	6	1
			其他	4	1		4	3
		工　人						
		農　民				4	2	
		不　詳				1		1
	籍貫	本省籍		12	8	10	9	6
		外省籍			1	3	3	1
		不　詳				2		1
				1927年6月	1927年7月	1928年2月	1928年5月	
河南省委	身分	知識分子	工運	1	3	3	3	
			農運	3	4	2	2	
			軍隊		1	4	4	
			其他	2	3	6	3	
		工　人			6	2	3	
		農　民						
		不　詳			11	3	3	
	籍貫	本省籍		2	5	8	5	
		外省籍		4	9	8	9	
		不　詳			14	4	4	

四、瞿秋白路線時期的陝西組織

國共分裂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指摘國共合作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領導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各級領導幹部咸以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為主；所以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在八七會議後，即指示各地拔擢工農階級幹部，特別是工人無產階級幹部，以掃除過去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那麼各地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呢？

從表二可見，河北順直省委在國共分裂後，省級幹部中工人與工運出身者的數量確實有增加趨勢，且直到 1929 年 6 月止，都是以工人出身的黨員為書記。河南省委在國共分裂後也一度拔擢了許多工人與工運出身的幹部。不過，陝西省委卻幾乎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原因主要在於陝西缺乏現代產業，且過去的幹部原來就沒有工人與工運出身者。唯一一位算得上是與工運有關的幹部是張國藩，其曾參加上海 3 次工人武裝暴動，並在四一二事件後歸陝。相反的，河北與河南向來就是工人運動的重心，許多冀、豫工人或工運出身的幹部，都是國共分裂前就已在該省活動。

所以八七會議後各地拔擢工農幹部，既是出於中共中央的新路線，也與各地的實際情形有密切關係。如河北、河南有較多工人與工運幹部，即與是工運中心有關。且因為農民運動（特別是紅槍會運動）也是中共在河南地區的一項工作重點，所以國共分裂後河南省委也任用了一些農運幹部，並曾在信陽、確山等地發動幾起大規模的農民暴動。而河北在國共分裂後，只在玉田發動過一場農民暴動，這也反映在順直省委幹部缺少農運與農民出身者的事實上。

陝西省委在八七會議後，不僅沒有拔擢工農出身的幹部，且幹部中軍隊出身者亦居多數，這一點事實上也反映了陝西的地方特色。陝西組織從一開始就與軍隊或地方武裝團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再加上國共合作時期陝西地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配合國民軍的行動；如 1927 年 2 月成立的陝甘區委，7 位委員中除農委書記亢心栽外，其餘若非軍旅出身或工作，就是與軍隊有密切關係。

所以國共分裂後許多省委幹部與軍隊有關，並不讓人意外。在 7 月成立的省委 12 位幹部，只有 2 位是 5 月後新到陝西工作；9 月改組的省委 9 位幹部中，只有 1 位是 7 月新到。可見八七會議前後陝西省委組成有相當大的延續性。

此延續性也表現在省委的工作上。由於幹部過去工作經驗的局限，以及當時上層政策的模糊，八七會議後陝西組織雖然提出到農民中去的口號，也斷絕了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但仍寄望於聯合地方小軍閥打倒馮玉祥的國民軍，所以當時仍是專注於軍事工作。如所謂的「清澗起義」即是由共產黨所掌握的井岳秀部石謙旅李象九營，在石謙於 1927 年 8 月被井岳秀殺害後遭到圍攻，故不得不於 10 月宣布「起義」。中共派唐澍等人到部隊中掌握領導權，率軍攻打宜川，最後以失敗告終。由於陝西組織在國共分裂後仍側重在聯合地方小軍閥的工作，如此就不難理解爲何陝西省級幹部在八七會議後仍以與軍隊有關係者居多。

由此看來，國共分裂後陝西的組織呈現出如此強的延續性，首先應歸因於既存的地方因素。當然，這也不是完全否認外來因素。八七會議以後瞿秋白主導下被稱爲「盲動主義」的路線，對陝西的組織與革命活動，並不是完全沒有影響。1928 年 1 月陝西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提出由部份的農民暴動發展到全省的總暴動，並且反對一切軍閥戰爭，即放棄過去聯絡地方小軍閥打倒馮玉祥的作法，這些提議明顯是受「盲動主義」路線的影響。[17]反映在幹部組織上，原省委書記耿炳光即因爲反對暴動路線遭撤職，由潘自力取代；同時陝西省委也提拔了 4 位農民出身以及 1 位擔任職工運動的幹部。而根據潘自力的報告，國共分裂後全省黨員減至一千四百餘名，但到 1928 年初又恢復到三千餘名，且新發展的黨員中，農民就佔了 70％；全省黨員中，農民也佔了 40％，團員中則佔了 30％。[18]陝西組織彷彿也像河北、河南組織般，開始步上了工農化的道路。所以外來的中共中央路線，對陝西的組織也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

17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271-275。

18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284-295。

但是陝西組織的工農化並不是沒有在地基礎的，北伐時期即已透過農村武裝團體的首領，間接動員農民起來響應戰事，如武功「硬團」的吳德印就是一例。國共分裂後，陝西組織仍舊採取此一辦法動員農民，如 1928 年 2 月中共於澄城成立東府特委，其中當地出身的幹部幾乎全部與紅槍會有關。渭華暴動的中心高塘鎮也是紅槍會的重鎮，在北伐前即有黨員趙和民擔任高塘鎮民團的副團長，這類民團與槍會、土匪經常重疊。[19]當然，透過這些武裝團體的首領所間接動員起來的農民，缺乏政治與階級覺悟是可以想像的。反映到組織裡，如陝西省委所言，國共分裂後農民雖佔黨員的 40%，但多數不是貧農，而各級指導機關也仍是知識分子佔多數。[20]這就說明當時陝西組織的工農化僅止於形式。無論如何，正是透過這些地方武裝團體的關係，陝西組織才有可能在國共分裂後短短幾個月內就有上千名的農民加入。

不管是外來或在地既存的因素，在國共分裂後陝西的革命與組織活動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實上，若不透過在地成員及既存的關係網絡動員，中共中央的路線與政策難以推動；但是若沒有上層的催促，地方的成員往往也呈現自發、散漫與不動的狀態。[21]許才升是個例子，他是旬邑人，1903 年生；國共分裂後到三原與縣委書記張性初碰面，被張批評是右傾機會主義，不舉行暴動。許被辱罵後大爲激憤，回旬邑即發雞毛帖，動員數百名農民攻入縣城，殺死縣長，成立旬邑蘇維埃政府。但不過 7 日，蘇維埃政府委員即遭到叛變群眾逮捕，被移送汾州，中途遭到士紳殺害。此即發生於 1928 年 5 月的旬邑暴動。[22]這段記載有幾點非常值得注意：第一、張性初在國共分裂後曾擔任

---

19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甲冊 1，頁 449。

20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325。

21 賽爾登（Mark Selden）也發現國共分裂後陝西地區農村暴動肇因於三個因素：個人的關係、意識形態的訴求和客觀的軍事經濟條件。此一分析與本文的論證有異曲同工之妙。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 26.

22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276、886。這裡是根據日後曾任陝西省委書記杜衡的自白。

省委委員，辱罵許是右傾機會主義，顯然是受到當時「盲動主義」路線的影響。許才升的激憤，也證明前面所言，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成員在思想上相當激進。第二、透過發雞毛帖動員農民的行爲，也說明了這些知識分子成員有其傳統的、在地的一面。因爲發雞毛帖正是紅槍會等地方武裝團體彼此互通聲息的辦法，許本人也可能是這類團體的成員或首領。現在也知道，旬邑暴動前夕發生嚴重春荒，應該就是農民響應許的號召之主要原因。[23]可是最後被農民背叛逮捕，也說明了這些農民如同北伐時期起來響應的農民團體，並不必然對革命抱持信仰，大多單純只是爲自身或地方的利益才起來行動，所以當客觀環境改變時，難免轉換立場。從旬邑暴動即可看到外來與在地既存的因素揉合在一起。

1928 年 5 月的渭華暴動也是一例。1928 年 1 月中共中央指示陝西省委，把所掌握的軍隊轉移到農運發展區域；隔月又發出〈關於兵士運動計畫〉。[24]這些指示是八七會議後專注於工農運動的中共中央允許開展兵運的訊號，與陝西向來偏重軍事工作的傳統一拍即合，當時陝西省委即派遣劉志丹、謝子長、唐澍等人到許權中旅工作。許旅以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和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的政治保衛隊成員爲骨幹組成，領導者多是中共人士。1928 年初許旅駐在洛南縣一帶。當此之際，渭南縣爆發了「宣化事件」。該縣槐衙村有一所宣化高小，教師多是共產黨員；後有反共人士主導的樂育高小遷入，兩造爲了爭奪學生發生衝突，樂育高小率人驅走宣化高小的共產黨員教師，並佔領該校。後中共渭南黨、團縣委動員農民，驅走強佔宣化高小的「反動分子」，擊斃其中兩名，毆傷數名。陝西省政府當局乃嚴令關閉渭南、固市學校，嚴辦、逮捕共黨分子，其中渭南中學校長與教師共產黨員王文忠與冀月亭遭到活埋。作爲反擊，地方

23 陳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史》，頁 44-46。
24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頁 44-48。當時共產國際也鼓勵中共推動士兵運動，並批評此一運動迄今在革命隊伍的行列中是大大落後的。中共中央對兵運態度的轉變，與國際的指示應該也有關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 7，頁 282。

共黨也組織群眾，擊殺地方官員與「惡紳」，抄沒豪紳家庭，並進行抗租、抗債、抗糧、抗捐、抗稅等鬥爭。對此，中共陝西省委即決議「許旅出山，幫助農民暴動」。該年 5 月 1 日，渭華暴動正式開展，渭南、華縣各地村莊發生暴動，乃至成立蘇維埃政權。但是許權中最初並不願將部隊開往渭南，反而隨李虎臣（許旅屬李部）赴潼關欲阻馮玉祥回陝之路。唐澍等共產黨員因此在未告知許權中的情況下，途中調走一部份部隊到渭華，許知道後，不得不前去渭華。部隊在抵達高塘鎮後，即宣布成立工農革命軍，由唐澍任總司令，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許權中僅任軍事顧問。[25]就在許旅加入後，渭華暴動勢力迅速擴大，但也因此引來當局的圍剿，堅持迄 8 月以失敗告終。[26]

中共中央與陝西省委後來皆批評，渭華暴動是在瞿秋白盲動路線下，一場毫無群眾基礎的軍事冒險。[27]然而，如上所述，渭華暴動實係肇因於地方菁英間政治立場、勢力與利益上的衝突，在共黨的煽動下演變成農民與政府的對抗；而這原是當地長期存在的傳統，高塘鎮等地本身就是紅槍會的大本營。但是，僅止於地方菁英的衝突、農民對國家的抗議，以及紅槍會等傳統；沒有外來的中共上層催促，乃至於調動許權中之旅前來助陣，事件也不會擴大成渭華暴動。無論如何，正是在外來與在地因素相互作用下，渭華暴動才可能發動，所以不能單單歸因爲「盲動主義」的產物。

綜上所述，自國共分裂以來，陝西的組織既出現了斷裂性，也有其延續性。斷裂性主要是來自外來的中共中央路線的影響，外來影響有些僅止於形式，如組織的工農化；但也不是完全無關痛癢，如耿炳光與許權中因爲反對暴動路線而遭到撤職或批評。在渭華暴動中，外來因素也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不過，國共分裂後陝西的革命與組織活動，依舊表現出較強的延續性，其具體表現如省委成員中本省籍多過外省籍，成員也以具有軍事經驗者居多，缺乏工人或工

---

25 據當事人的回憶，許權中最初並不贊同暴動，因此差點被開除黨籍。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626-627、634-636。

26 陳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史》，頁 25-42。

27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261；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386。

運出身者，又如依賴既存的在地關係與網絡進行組織的聯結與活動等等。當然，也如前述，所謂斷裂與延續性或外來與在地因素，都是同時存在，缺一不可的。不同時期有不一樣的表現，例如，渭華暴動失敗後地方組織遭嚴重破壞，加強斷裂性的一面，這也是下面欲探討的議題。

五、組織正規化的改革

與順直與河南省委比較下，陝西省委表現出較強的在地性格，如省委成員中本省籍幹部始終居於相對多數；此一在地性格也表現在經濟上。由於組織成員許多是在地農村出身，所以在農村裡的活動，不僅不用上層的支持，反倒還能給省委援助。根據 1928 年 8 至 10 月陝西省委的經費收支表，省委支出主要用在自身生活費、辦公費等等；且每個月都有固定對職工運動的支出，但是卻沒有給農村組織與農運的支出，這正是因爲省委位於西安，無農運支出的需要，同時地方黨部也能夠籌措自己需要的經費。再從收入分析，8 月份的收入中，包括軍委由蒲城解來款項 59 元與中共中央匯來的 123 元。其中軍委解款應是渭華暴動在地方上繳獲的款項，所以暴動失敗後，9、10 月份即沒有軍委從地方解款。相反的，中共中央支援的款項卻逐月增加，9 月份爲 500 元，10 月份至少達 800 元以上。[28]這些收入的改變說明了以下事實：

首先，渭華暴動失敗中斷了來自地方的經濟援助。據組織史資料的記載，渭華暴動過後，西安周圍地區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成員星散。如華縣的陝東特委即自行解體，黨、團華縣縣委也分別於 1928 年 8 月、1929 年春停止活動，迄 1930 年下半年仍未恢復；三原縣委負責人張性初逃往上海避難，縣委停止活動；長安縣委書記張鼎安於 1928 年底被捕，縣委停止活動；蒲城的李維屏在宣化事件後即逃離本鄉，王勉之則是與黨失去聯繫，留在當地從事教育活動。原來省委在渭華暴動後還常駐 2 位常委在渭南，但由於長時期沒有發展，

[28]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五年——一九三六年》，乙冊 1，頁 122-125。

最後也不得不將之調到西安工作，並於 1930 年初解散渭南縣委，改成立 4 個特支，但工作大體上仍處於停頓狀態。[29]在這種情況下，「過去能給省委解款的地方黨部如渭、華，現在自己地方黨部經費還要靠省委津貼，哪裡還有力量給省委送錢」。前述一些地方黨部的崩潰，正是因爲成員窮到沒飯吃、沒衣穿、沒房住，不得已放棄工作而潛逃。[30]留在渭南、華縣等地堅持活動的成員，過得非常艱苦，特別在經濟方面，只能做一些「弄錢的特務工作」，以致被群眾視爲土匪。[31]也正是因爲省委失去來自地方的解款，反要補助地方，所以渭華暴動失敗後，中共中央撥給陝西的補助才會逐月增加。

1929 年初陝西省委因曹趾仁等人被捕叛變遭到大破壞，更加強省委對中共中央的依賴。倖免於難的王芾南等人倉促地成立臨時省委後，即組成代表團赴中央求援。7 月代表團帶著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經濟上的援助回陝，從此陝西組織經濟上便要接受中共中央的支援與監督，如省委 9 月的報告即指出，代表團回陝以前，省委的經費是東拉西扯，沒有詳細的預、決算，此後每月都要向中共中央報備。[32]除此之外，中共中央還藉機要求陝西省委推動一連串組織正規化的改革，包括：建立中心區域工作、深入工人群眾、建立支部生活、整理地方黨部、縮小省委機關、發展群眾組織、建立經常的秘密工作、提高黨內政治水平、健全黨團關係等。[33]因此自 1929 年下半年，省委即推行若干措施，如成立秘書科，建立常態性的巡視、教育、宣傳等工作，更重要的是打破過去各級組織繫於少數成員的英雄式領導。這些組織正規化改造的要求，原來中共中央過去也曾斷續提出，但是 1929 年 6 月六屆二中全會李立三上臺後，隨著

[29]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甲冊 3，頁 211。

[30]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343-344。

[31]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367-369。

[32]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489。

[33]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290-292。

中共中央的路線轉趨激進，更加強調組織正規化的改造，特別是掃除混入組織內部的地方富裕家庭出身的「富農階級」成員，這些人被指控掌握組織的領導權，使黨發生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所以中共中央要求提拔貧僱農取代富農成員，也就是以組織取代個人英雄式領導。[34]同樣的，過去透過某些群眾團體領袖（被指爲富農階級）動員紅槍會、土匪等群眾武裝團體的作法，也遭到禁止；而要打入下層，動員下層群眾起來打倒反動領袖，以改造該團體。[35]此即被稱爲第二次左傾立三路線的一個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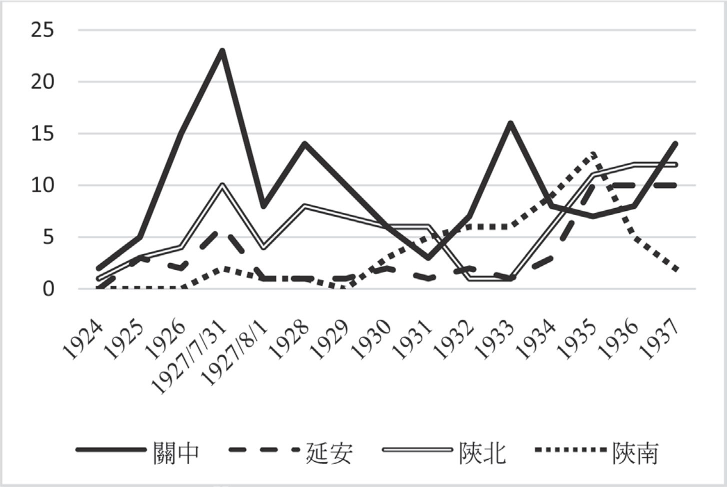
這些正規化的改革措施，與過去透過既存關係網絡自發性地發展組織活動的辦法，迥然不同，甚至是對立的。如過去掌握各地組織領導的知識分子成員，即被批評是富農階級。不過，就結果看來，這樣正規化的改變並未能挽救國共分裂與渭華暴動失敗以來組織每況愈下的窘境。如圖二所示，以西安爲中心的關中地區，國共分裂後一度僅剩 8 個縣市有組織；1928 年在暴動的高潮下恢復到 14 個；不過，在渭華暴動失敗後，每況愈下，1929 年剩 10 個，1930 年只有 6 個，到 1931 年竟僅剩下 3 個縣市有組織活動。直到 1932 年後才又開始成長，並於 1933 年發展到 16 個，呈現復甦的跡象。

相反的，以綏德爲中心的陝北地區有組織的縣市數，國共分裂以後也一度從 10 個減到只剩 4 個，但 1928 年又暴增至 8 個，隨後迄 1931 年，陝北地區有組織的縣市數量並未如關中地區般逐漸遞減，而是呈現持平的現象，直到 1932 年才銳減至 1 個。

34　在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即通過一項組織問題決議案，要求各地組織提拔工農群眾、改造舊基礎、建立支部生活、健全中心區域工作、加強地方黨部工作等等，與前述中央對陝西的組織改造要求不謀而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5，頁 213-248。

35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甲冊 3，頁 74-94、108-111。

圖二　陝西地區中共組織分布數量



怎麼去解釋上述現象？參酌同時期發生的事件，可知外在因素是導致組織擴增或縮減的首要因素，如國共分裂導致組織數量的萎縮，1928 年中共中央暴動路線刺激組織的增長，暴動失敗與隨之而來白色恐怖的迫害導致組織數量遞減等。同樣的，1932 年後陝北地區組織的銳減，即肇因於前一年春組織遭到當局的破獲。至於 1932 年後關中地區組織的擴增，則應歸功於外來的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的建立，此點容後文再述。

既存的關係網絡在組織維繫上也產生重要的功用。如陝北地區組織雖然也隨著外力影響起起伏伏，然而，事實上陝北一直是省委鞭長莫及之地。因爲交通原因，陝北與北京方面反而更多往來（綏德到西安要半個月的旅程，到北京只要八、九日），但在組織上卻屬於陝西省委所轄。而省委由於主觀、客觀的原因，既不能給予陝北組織實質上的幫助（陝北成員抱怨中共中央每月接濟陝西全省 600 元，但陝北一文錢沒有收到），結果也就管不上陝北的組織。所以當 1928 年關中各地區在上層「盲動主義」路線與省委的指示下發動暴動時，陝北地區並沒有發動任何大規模的暴動，因此 1928 年後陝北的組織並未如關中地區般縮減。1929 年省委開始推動組織正規化改革以後，陝北組織也未亦

步亦趨，仍舊與過去相同，鬆散且不嚴密，許多組織根本不健全，只有 1 個人在負責工作而已。[36]

這些掌握陝北各地組織的人，如同過去，成員大多是在地出身且在教育界活動的知識分子，組織經費也多由其供給。這些人即是當時中共中央與陝西省委所批評的富裕家庭出身者，透過私人關係網絡，「你拉你的相好，我叫我的知音」，招徠許多同是知識分子的親朋好友；有人還回家把自己的佃農、僱農發展成黨員。[37]還有人依舊像過去透過某軍隊或土匪的官長間接動員群眾。[38]這樣的作法完全與省委所推動的正規化改革背道而馳，但也產生相當成效。根據一份統計，1929 年 9 月陝北地區黨員數量 1,080 名，不僅全省最高，且超過全省其他縣市黨員數量的合計。並且其中農民出身的黨員 800 名，同樣爲全省最高，其次的渭南縣才有 50 名。[39]儘管如此，由於缺乏外來的領導與刺激，陝北組織依舊缺乏活動力，始終沒有發動任何值得注意的暴動。甚至地方農民自發地起來抗爭時，如綏德 1930 年就有 1 萬農民闖入縣城驅逐縣長的事件，陝北組織卻不知道此事。[40]無論如何，1929 年省委開始推動的正規化改革，既未能挽救關中地區組織的頹勢，對陝北地區也影響甚微。

事實上，當時陝西省委推動正規化的能力很有限。首先，省委來自中共中央的經費不足，自身都要靠借貸度日，更不用說接濟地方了，因此不僅自身組織不健全，根本也無從影響地方推動正規化的改革。除陝北組織外，省委對其他各地方組織的控制力也相當薄弱，例如 1929 年 5 月陝西代表團自上海歸來，省委開始推動正規化的改革後，過了整整一年，竟沒有接到任何地方黨部繳來

36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408、413-423。

37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一）》，甲冊 4，頁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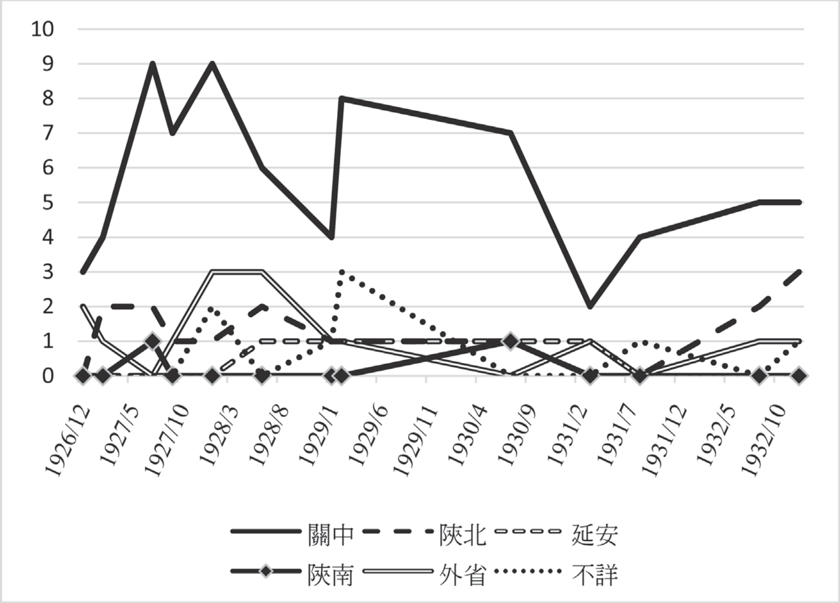
38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408。

39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甲冊 2，頁 490。

40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甲冊 3，頁 261。

較有系統的報告。省委將此惡劣現象歸咎於陝西組織的歷史遺產。[41]

圖三　中共陝西省級幹部出身地域別分析



再如圖三省級領導幹部出身的地域別分析所示，陝西省級領導始終以關中地區居多，即使 1929 年推動正規化改革後仍舊如此。也就是說，陝西省委自身即是一個地方性的產物，此種局限不免阻礙組織正規化的開展，1930 年渭北游擊戰爭的失敗就是一個具體例子。

渭北游擊戰爭是 1930 年 6 月爆發於三原縣北區與富平縣一帶的一場暴動。該處由於農村經濟破產，土匪蜂起，民團林立。1930 年陝西省委召集陳雲樵與黃子文，計劃在該地策動暴動。陳是興平人，曾在楊虎城部工作；黃是在地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出身，已在當地活動多時。省委指示黃、陳到三原後，要致力策畫地方暴動，不要再像過去透過土匪領袖聯絡土匪，反映前述組織正規化的改革。然而黃、陳限於過去的經驗與出身，未能擺脫此一土匪路線。

41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甲冊 3，頁 243-244。

事實上，陳本來是被派到岐山、扶風西路一帶工作的，1930 年上半年中共在岐山一帶的工作有相當大的發展，但主要也是土匪工作，如該地最大股柳萬青土匪（也是當時全省勢力最大者，達2萬人之眾）即有中共的組織。[42]而中共最初也想利用此一土匪勢力在西路一帶發展游擊戰爭，後來失敗陳才被派到渭北工作。

黃子文出身黃埔軍校與其受到重用不無關係，不過在渭北游擊戰爭中，在地關係發生更大的作用。黃與陳來到三原後，立即與一土匪領袖王德修聯絡。王是在地知識分子出身，1927 年加入共青團，曾在國民聯軍駐陝總政治部服務。陰曆 5 月 15 日晚，王帶了三十多人 21 支槍發起暴動。但本是烏合之眾，到處搶掠拉票子，王雖身爲領袖且軍隊出身，但因缺乏軍事經驗與常識，不能駕馭下屬，反被牽著走。當政府派軍隊圍剿時，游擊隊甚是恐慌，乃決定與土匪石老五部聯合。根據陝西省委的報告，後來游擊隊又加入兩股王姓土匪，其一是黃靠同學關係拉來的。游擊隊一度成長至百餘人，並由陳雲樵擔任隊長。但這只是一群缺乏戰鬥力的烏合之眾，有一晚被紅槍會四、五個人擊敗後，隊伍潰散。內部土匪各懷異志，陳雲樵完全不能控制，黃子文則是礙於面子，不能堅決解決與其有關係的土匪，反而予以優待。7 月編入游擊隊的土匪張成義部突然叛變，游擊隊伍即分化瓦解，渭北游擊戰爭完全潰散。[43]

渭北游擊戰爭中，陝西省委一開始是要黃子文、陳雲樵透過更正規、更符合上層階級路線的辦法去動員群眾，但是黃、陳深受過去經驗與地方既存關係網絡的局限，仍有意無意地透過在地的土匪領袖間接發動群眾，結果反被後者束縛，最終失敗。這也部份說明了爲何省委所推動的正規化改革不能奏效，同時也意味著陝西的組織與革命活動仍相當程度上受到既存關係網絡等因素的束縛，而具有強烈的地方性色彩。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強烈的地方性色彩，也有助於組織的維持，同時避免受中共中央過激的政策牽連，以致被破

42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甲冊 3，頁 64。

43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甲冊 3，頁 213-227；陳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史》，頁 115-117。

壞殆盡，如陝北的組織長期以來沒有發動任何大規模的暴動，也因此未被渭華暴動的失敗牽連，就是一個例子。由此看來，外來或地方因素、正規化與地方色彩各有其優缺點，對於革命的生存與發展來說，兩者缺一不可。

六、立三與王明路線

陝西組織具有濃厚地方色彩而缺乏外來組織領導等外力刺激，雖然活力不足，但也相對的穩定保守。這一點還可以從陝西與河北兩地組織的比較看出端倪。如前所述，與陝西省委不同，國共分裂以後的順直省委表現出較強的外來性格，其具體表現如本省籍幹部始終沒有超過外省籍，當時本省籍幹部對此也頗有微詞，自國共分裂以來持續迄 1929 年的順直省委事件部份即是肇因於此；再者順直省委受到中共中央的影響較大，以致容易捲入上層的政治與派系鬥爭，如順直省委一開始成立，蔡和森與彭述之的鬥爭就是一例。但是，在國共分裂後的陝西組織內部卻沒有發生這類衝突事件，主要原因即在於強烈的地方性格，受到中共中央的影響遠比河北組織爲小，同時也不存在幹部間的土客衝突。

表三是國共分裂後 1927 至 1934 年間中共陝西省委幹部的分析表，可以發現：省委幹部年齡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這正是由於省委幹部是由本省籍人士自然地代換，而甚少外來的空降部隊，因爲後者一般說來會傾向年紀較長經驗較佳者；這從第二項幹部籍貫本省籍始終佔絕對優勢也可獲得證明。第三項幹部出身則說明中共中央工農化政策並未在陝西充分貫徹，間接證明了陝西省委受到中共中央影響與牽連的程度較低。再如圖四所示，一開始有外省工作經驗者居於相對多數，這是因爲當時國共剛分裂，省委內部還有一些當初爲推動國共合作而被中共中央派來陝西，或是因爲外部環境改變被迫回籍；然而，1929 年 3 月由於省委組織的大崩壞，前省委或是被捕，或是被迫轉移與隱藏，以致不得不大量拔擢地方下層幹部補充省委缺額，此後有本省下層幹部經驗者的數量就未再低於有外省工作經驗者。弔詭的是，也正是自同一時期省委開始推動正規化改革。而如前所述，地方化本身可能局限了正規化的改革，省委幹部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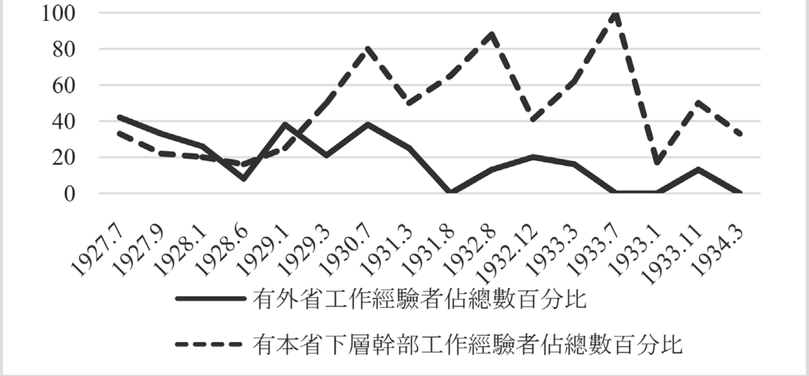
歷的分析似乎也部份說明了爲何正規化改革未能奏效。

表三　中共陝西省委幹部分析（1927-1934）

組織成立時間（總人數）	出生年代			籍貫		出身			在省委任職前的經歷						
	1900前	1901~1910	1911後	本省	外省	工人	農民	知識分子	外省工作	團省委幹部	本省下層幹部	暴動	赴俄	軍隊	教師
1927.7(12)	3	9		12				12	5	1	4	1	1	6	4
1927.9 (9)	3	6		8	1			9	3	1	2		3	6	1
1928.1(15)	3	8		10	3		4	10	4	1	3		3	7	1
1928.6(12)	4	7		9	3		2	10	1	2	2	4	3	6	2
1929.1 (8)	1	5		6	1			7	3	2	2	2		1	3
1929.3(14)	3	6		10	1			10	3		7	7	1	2	4
1930.7(10)	1	7		10		1	1	8	3	1	8	1	3	3	1
1931.3 (4)		3		3	1			4	1		2		2	1	
1931.8 (5)		3		4			1	4		1	3	1	1	1	
1932.8 (8)	1	6	1	7	1		1	7	1	3	7	4		2	
1932.12(10)		7	1	8	2	2		8	2	2	4	1		4	
1933.3 (10)		5	1	7	2	1		7	1	3	6	1		3	
1933.7 (5)		2	1	4			1	4		1	3	2			1
1933.10 (6)	1	2	1	4				3			1	1		4	1
1933.11 (8)		1	2	7				6	1		4		1	2	
1934.3 (6)		2	2	4				4			2	1		3	

說　明：各項總和與總人數有出入，是因爲部份人出生年代、籍貫、出身不詳或經歷重疊之故。

圖四　陝西省委幹部任職前經驗比較



1929 年 6 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後，立三路線逐漸抬頭，並於隔年臻高峰。中共中央爲貫徹立三路線，也於 1930 年 4 月改組順直省委。在新的省委成員 14 人當中，前屆（1929 年 9 月）省委 12 人留任者僅 4 人。如表四所示，這些新到河北工作的幹部都是外省籍。在貫徹上層指示上，不僅較不受到地方經驗與情感或人際關係的局限，且許多都是中共中央級或中央空降河北的幹部，故具有豐富的工作與人生歷練；如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賀昌、廣東省委軍委書記的聶榮臻，他們都是當時立三路線在河北的忠實執行者。至於前任的本省籍順直省委委員張兆豐、郝清玉等人則被派到下層去執行立三路線的暴動。但賀昌等人最終未能如立三路線所指示般掀起河北的革命高潮，張兆豐等人還爲了組織士兵暴動而被捕處死。

表四　立三路線時期中共陝西與順直省委比較

類別		順直省委		陝西省委	
		1929 年 9 月	1930 年 4 月	1929 年 3 月	1930 年 7 月
總人數		12	14	14	10
籍貫	本省籍	5		10	10
	外省籍	7	10	1	
出生年代	1900 年前	5	7	3	1
	1901-1910 年出生	6	3	6	7
	1911 年後	1			
經歷	曾在本省工作	11	3	10	9
	曾在中央工作	6	8		
	曾在他省工作	7	10	3	3
	中央或上層派來	8	10		1
出身	赴俄經驗	6	6	1	3
	軍隊經驗	3	3	2	3
	工人出身或工人運動家	5	4		1
	農民出身或農民運動家	2	1	6	3

說　明：各項總和與總人數有出入，是因爲部份人出生年代、籍貫、經歷、出身不詳或重疊之故。

與河北比較下，陝西在立三路線時期表現平靜。1930 年 7 月陝西省委改組，10 人中 7 人是新上任者。參照表三與表四可知，新上任者大部份是曾在本省工作且還是從下層提拔上來的。事實上，當時由上層派來者只有高維翰，

他具留俄經驗，1930 年 10 月前後由河北的北方局派來，所以與立三路線沒有關係，毋寧是爲傳達當年 9 月反立三路線的六屆三中全會指示而來的。至於離職的省委幹部，大多也是被捕、躲藏、治病等原因才退出，所以陝西省委並不是爲了執行立三路線才改組的。雖然接受立三路線，也爲推動路線布置了一些暴動，但都是空洞的指示，沒有實際的成果。[44]

再就成員分析，陝西省委較順直省委年輕，沒有像賀昌、聶榮臻般中央級且具豐富革命工作經驗者。如立三路線時期擔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杜衡，1907 年生，擔任書記時不過才 22 歲。1930 年 7 月陝西省委平均年齡爲 25.1 歲，順直省委的平均年齡則爲 31.2 歲。雖然當時順直省委書記賀昌也才大杜衡 1 歲，但兩者在經歷上卻是天壤之別。賀昌是山西人，早年在北方等地從事工人運動，曾參加 1927 年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南昌暴動，並負責湘鄂贛邊區的工作，1928 年出席中共六大，1930 年派到河北工作。杜衡則是自綏德四師畢業就一直在陝西工作，值得一提的經驗只有 1927 年時曾在石謙部從事過兵運，這或許也是他在國共分裂後被提拔爲省委的緣故吧！杜作爲省委領導幾次赴上海、北京彙報工作外，就沒有在外地工作的經驗，是一個十足的土著幹部。

193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以王明爲首的國際派上臺，內部爲此發生分裂，羅章龍、何孟雄諸位成員在上海召集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前順直省委書記張慕陶等人成立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反對四中全會，導致河北組織的分裂；兼之隨後組織被破獲，1931 年整個河北省委不斷處於破壞與重組的動盪狀態中。光是這一年省委書記即換了 5 任，除趙聲的經歷不詳外，徐蘭芝、阮嘯仙、殷鑒、馬星榮都是外省人，其中徐、馬是工人、工運出身，阮、殷、馬均有赴莫斯科學習的經歷。事實上，徐蘭芝只是掛名書記，實際掌權者是也曾赴莫斯科學習的陳原道，陳與殷兩人被認爲是王明爲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成員。明顯的，國際派領導的中共中央也乘紛亂之機，抓住河北省委的領導權。

44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402-410。

陝西省委卻不是如此，1931 年 1 月接到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的指示後，即加入籌備處行列；旋即中共中央的指示也來到，才驚覺錯誤，立即改變立場接受四中全會的領導。所以陝西省委並沒有像河北等地，因爲四中全會而發生分裂。再就組織成員來說，與 1931 年河北省委動輒 10 人以上相比，如表三所示，陝西省委該年最多時也才 5 個人，而且據當事人杜衡所言，實際在工作的只有他和高維翰兩個人。[45]就當年曾擔任過省委的 7 個人進行分析，除去中共中央交通員黃平外，其餘全是陝西在地，沒有工人出身者；有工運經驗者僅黃平 1 人，有赴蘇留學經驗者爲高維翰與黃平 2 人，但沒有「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成員。如此看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對陝西的影響及支援，遠較河北爲低。

但是，這並非是說陝西省委完全沒有受到四中全會後新路線的影響。前述陝西省委書記杜衡過去是立三路線的代表者，四中全會的指示來到後，立即轉向新的中共中央宣示效忠。杜衡所以如此，是出於革命的熱誠。如前所述，早期陝西有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成員，所以投身革命行列就是出於熱誠。在 1929 年後擔任省委的吉國楨（留學蘇聯歸國者）很生動地描述，當時陝西省委領導爲知識分子，多係書生式的認識，一切決定只知道跟著中共中央跑，實際上政治水平並不高；杜衡即這類的知識分子成員。[46]

省委成員中曾擔任教師的人數如表三所示逐年減少，事實上也部份反映了職業革命家化。如前所述，陝北特委很多成員都在教育界工作，無論在教育廳或回鄉擔任教師，這使得陝北組織成員較不依賴上面的補助，同時也表現出較強的地方化。至於像杜衡般的省委變成領取薪津的革命職業家後，一般會變得更加忠誠且死板地追隨上級指示，也更加脫離地方、脫離實際。1930 年底，立三路線已宣告結束而四中全會尚未召開前，陝西省委內部曾爲未來發展路線發生爭論。以杜衡爲首的省委成員仍依循立三路線，主張當時陝西的群眾鬥爭

[45]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一）》，甲冊 4，頁 270。

[46]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408-410。

仍是處於新的高漲形勢，另有李艮、張文華與黃子文等人持相反的意見；結果杜衡的主張佔上風。有趣的是，反對杜衡的成員都是最近曾到基層工作者，如張文華和李艮當時在渭南，黃子文則是渭北暴動的領導者。相反的，杜衡則是自 1929 年被提拔擔任省委書記後，就幾乎未再到下層擔任實際工作。無論如何，杜衡最後獲得勝利，隨後把反對他的張文華、張資平等人開除黨籍，李艮則因爲承認錯誤被留下來，並擔任省委委員。[47]

杜衡的勝利，也意味著陝西省委內部的激進派戰勝了較重視地方實際的溫和派。但是，如前述陝西組織長期以來即具有較濃厚的地方性格，杜衡的勝利，也不過僅止於省委內部。無論杜再如何激進，沒有下層幹部的合作，也難以貫徹中共中央的路線。因此，這場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並未就此告一段落。

七、北方革命的高潮

如圖一所示，陝西的組織在 1932 年後開始有蓬勃發展的趨勢。除陝北的組織由於特委在 1931 年春遭到破獲而急遽減少外，關中與漢中地區的組織卻呈現逐漸復甦的跡象。全省有組織成立的縣市數量在 1931 年僅有 15 個，1932 年 16 個，到 1933 年即突然增加到 24 個，乃至於 1934 年的 26 個。事實上，這不僅是陝西省單一的個案，如河北省（不包括今日的北京與天津市）1931 年有組織的縣市數量爲 34 個，1932 年也突然增加至 44 個，1933 年與 1934 年分別爲 50 與 48 個。爲何會發生 1932 年後北方地區組織的復甦此一現象呢？第一、與中共中央路線的關係：1932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簡稱北方會議），決議北方各省革命形勢是「突飛猛進的發展著」，所以各省應即致力於發動城市的工人罷工、農村的游擊戰爭與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乃至於建立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第二、與客觀局勢的變化有密切關係：如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1933 年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等事件，在在都刺激了北方地區革命活動的發展。

47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727-728。

不過，陝西地區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軍隊因素。首先，陝甘邊地區在渭華暴動失敗以後，謝子長與劉志丹等地方成員回到陝北；其在地方民團與土匪等武裝團體間原來就有關係，1929 年 4、5 月間中共陝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紅石峽召開擴大會議，決議劉志丹擔任特委軍委書記，劉提出從事白色的兵運、灰色的土匪運動，加上動員群眾，最終建立紅色的共產黨軍隊。1930 年謝被調往上海中央特科學習，劉則繼續留在陝甘邊區，並於 1931 年 9 月在合水縣成立了陝甘邊境游擊隊，人數約三百餘人。同時來自山西呂梁山區一帶由閻紅彥領導的晉西游擊隊爲逃離當局圍剿，撤到陝北一帶，先是合併了幾支保護鴉片運銷的武裝隊，後於 10 月在合水縣會合劉的游擊隊，成立了一支超過千人的隊伍。謝子長也在此時被陝西省委派回隊伍擔任領導。12 月在省委的要求下，隊伍改編爲西北反帝同盟軍，南下發展。次年 2 月，同盟軍在甘肅省正寧縣三嘉塬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並在三原、富平、蒲城、耀縣等地開展活動，但最後還是回到正寧縣，於 3 月在該縣寺村原宣布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隔月隊伍改組爲紅二十六軍。

由此可見，最初謝子長、劉志丹的活動，主要是訴諸既存的關係網絡，從事地方民團、土匪以及軍隊等軍事活動。對照同時期組織的發展概況，如圖一所示，1931 年以前陝北地區的組織主要還是以綏德的陝北特委爲中心向外發展的，與謝、劉的活動沒有直接關係；至於陝甘邊區則要到 1932 年才開始有組織建立。也就是說，謝、劉這類依賴既存的關係與網絡所從事帶有相當自發性的軍事活動，並未相應地帶來組織上的發展，且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在地域上局限於劉志丹的家鄉保安周圍地區，再則是時間上斷斷續續，以致不能形成持續且大規模的活動。直到 1931 年下半年加入新的外來因素後，即 10 月與晉西游擊隊的會合及省委的加強領導，陝甘邊區隊伍才變得壯大，也突破了過去地域性的限制，不再局限在陝甘邊區活動，而開始向關中地區一帶發展。故如圖一所示，在 1932 年後關中與陝甘邊區的組織開始復甦與蓬勃發展起來。

漢中地區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現象。如前述，漢中地區本來即有組織活動，但不突顯，且一度中斷。1930 年陝西省委派梁益堂作爲陝南特委書記，赴漢中地區恢復組織，但是當時梁主要是以學校爲據點發展組織，所以成效有限。1931 年春，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第十七師孫蔚如部移駐漢中。孫部特別是所屬的五十一旅趙壽山部（兼漢中綏靖司令），與共產黨有千絲萬縷複雜的聯繫。就在此時，中共在漢中地區除了作爲地方黨部最高組織陝南特委外，還成立了一個陝南特委軍委，成員多與十七師有關，如該軍委書記李慕愚即在孫部任職，委員張繼華爲十七師英文秘書，委員孫作賓是十七師軍委書記，與孫蔚如也有親戚關係。這些地下黨員假該師名義，掩護地方革命活動的開展。據李慕愚回憶，當時他們即作爲該師的視察員，利用國民黨政府的權力，鏟除地方惡霸，發動群眾等等。[48]

1931 年下半年，省委委員賈拓夫到漢中巡視；黨員陳淺倫也於 1932 年回到漢中任陝南特委書記，其 1930 年在上海參加武裝暴動計畫被逮捕後釋放，漢中地區西鄉縣出身。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在賈與陳來到漢中後，革命活動有了極大的轉變，即「把學生運動引向了社會」。[49]其中陳淺倫回到西鄉聯絡地方武裝團體「神團」，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紅二十九軍，目的之一即是要聲援將於 1932 年底自鄂豫皖蘇區撤出而進入陝南的紅四方面軍。如圖一所示，後者的到來進一步刺激了 1933 年後漢中地區組織的發展。所以，漢中地區 1931 年以來組織的發展，與軍隊的進出以及省委的加強指導不無關係。

關中、陝甘邊與漢中等地區組織的復甦與發展，證明了前述既存的關係網絡等地方因素雖然有助於組織的維持，但進一步地擴展還需要外力的幫助。當然，外力的幫助對依賴既存的關係網絡所建立的組織，有時會產生破壞性作用。事實上，自陝西省委與陝甘邊區隊伍建立聯繫後，省委就不斷地想要把隊伍開出陝甘邊區，向渭北乃至西安一帶發展。如 1932 年 4 月省委書記杜衡到

48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漢中地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陝南特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 253。

49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漢中地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陝南特委》，頁 222。

陝甘邊區，率領軍隊南下渭北，卻受到重擊，以致 6 月隊伍撤回邊區時僅剩兩百多人。如前述杜衡是一個相當激進的省委領導，立場明顯是受中共中央左傾路線的影響。此一激進的主張雖然有助於刺激革命勢力的向外擴展，但也不能不遭遇極大的風險。由土匪、地方群眾組成的隊伍則傾向留在陝甘邊界一帶，因爲多山較易躲藏。此作法雖然平穩，但也未免保守，局限了革命勢力的擴展，甚至可能面對坐以待斃的危機。隊伍 6 月退回邊區後，當局的圍剿隨之到來，迫使隊伍不得不再離開邊區，向耀縣西北部照金地區游擊，因此建立了新的照金根據地。[50]

省委要隊伍聽命，就必須要改組組織，以掌握領導。事實上，1932 年 2 月陝甘游擊隊在三嘉塬的改組，就是一場省委與地方幹部、地方幹部彼此間的派系角力。前一年省委派來的謝子長結合晉西游擊隊的領導閻紅彥，指控劉志丹領導的第二支隊是由土匪組成，紀律極壞，因此在第二支隊沒有防備下，解除其武裝。謝、閻、劉等人或許存在著不爲人知的矛盾，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省委旋即在部隊裡設置了政委等正規體制，並先後由省委的特派員高維翰、李艮及杜衡本人擔任政委，掌握了隊伍最高的領導權。[51]

除了改造隊伍外，當時省委也試圖改組地方組織。如前所述，1929 年時省委爲加強對地方組織的領導，一度嘗試推動組織的正規化改革，其中一個目的即清除組織內部富裕家庭出身的成員，並提拔工農分子取而代之，但成效不彰。1930 年立三路線時期，中共中央更進一步具體地提出反富農的路線，就是針對黨內富裕家庭出身的成員。1931 年王明等國際派上臺後，也繼承了此一路線。當時陝西省委在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後，也承認「陝西黨目前最主要的危險是黨的基礎建立在消極悲觀的右傾分子與富農身上，黨的領導機關也是操縱在這些人的手中」，爲了執行新的路線的轉變，「先決的條件必須肅清右傾

50 陳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史》，頁 139-143。
51 劉景范，〈「三嘉塬事件」的眞相〉，「西北革命歷史網」，http://www.htqly.org/detail.aspx?Id=1141。（2016 年 8 月 15 日檢索）；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一）》，甲冊 4，頁 57、118-119。

消極怠工的富農分子出黨」。[52]在地方上，渭南、三原等地的組織即被批評「代表了富農階級」，並被要求提拔僱農、手工業工人等成員取代這些階級異己分子。[53]

前述 1931 年陝西省委派賈拓夫到漢中巡視也是爲了改組地方組織。[54]但是當時對地方組織的改組，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可以陝甘邊區中心區旬邑縣的組織爲例。旬邑在國共合作時期即有組織，國共分裂後 1928 年 5 月在許才升的領導下，發動了旬邑暴動，但旋即失敗，組織也因此停止運作。直到 1931 年後，才有一位 1928 年前即在旬邑活動的老黨員「老崔」在當地恢復活動。「老崔」很可能是崔廷儒，他是地方上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成員，在旬邑暴動失敗後失去聯繫，一度在隴東駐軍楊保成旅工作，1931 年返鄉。據省委所言，這位「老崔」當時在建設局當局員，整天忙自己的事，根本不管組織工作，是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的反映。1931 年下半年起，省委先後派焦維熾、李艮等人來恢復組織工作，並成立了以焦思洲爲書記的旬邑縣委。焦思洲是貧農出身，省委提拔他顯然是爲取代代表富農路線的「老崔」。可是發現工農幹部素質低，要教育相當困難，兼之經費不足等原因，結果仍不得不起用代表富農路線的「老崔」任縣委組織。事實上，貧農書記焦思洲早已經動搖，不願擔負工作，所以眞正掌握組織的還是「老崔」。[55]由此可知組織正規化與工農化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

再以渭北特委爲例，1932 年 10 月在陝西省委主導下成立，目的是欲建立以三原武字區爲中心的渭北蘇區，以呼應紅二十六軍，成員包括金理科、顧先

52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一）》，甲冊 4，頁 423。

53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二）》，甲冊 5，頁 74、132、140。

54 賈拓夫在前述 1930 年底省委書記杜衡與地方黨員張文華等人的爭執中，也站在杜的一邊。賈當時是年僅 19 歲的團省委委員，他和杜衡不僅同樣年輕激進，還曾有同在陝北被當局逮捕的經驗。又，在賈來漢中前不久陝南特委書記梁益堂剛離去。梁是老資格黨員，比杜衡大 5 歲，剛上任的年輕省委書記杜衡恐怕梁不好領導，所以在 1930 年調梁到陝南特委工作。賈拓夫的來到與梁的離去，也意味著杜衡的省委把勢力伸到陝南地區。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 688。

55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二）》，甲冊 5，頁 389-403。

臣等工農分子，反映了省委工農化的訴求。不過，從 1932 年 10 至 12 月間特委的組成看來，10 位成員中，除去身分不詳的鄭彥青外，其中高維翰、李沖霄是省委委員，黃子文與黃子祥弟兄是三原地方知識分子出身領導，程建文是富平黨知識分子成員，汪鋒、曾楚川是楊虎城軍隊工作出身，加上金理科、顧先臣兩工農分子。可見渭北特委的組成是省委與地方妥協下的產物，而且「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依舊是主要掌權者。黃子文也承認，三原黨在成分上貧農雖然佔最大多數，但是大多數幹部還是富農成分。[56]

事實上，連陝西省委自身工農化程度也相當低。如表三所示，省委自始以來，始終是以知識分子成員居絕大多數。其中一個問題在於工農分子的素質不高，即使提拔起來也不見得能夠發揮實際的作用。如省委在 1931 年即在中共中央巡視員的要求下，提拔一位農民劉萬海參加省委，但因爲能力不佳，所以只能分配一項工作，甚至只此一項也難以負擔。[57]

同一時期中共南方各大蘇區也在清掃富農與反革命分子的藉口下，整肅了許多地方富裕家庭出身的黨員，此即所謂的肅反。當時陝西省委也想訴諸同樣手段整肅異己，卻困難重重。如當時渭北蘇區中心區三原縣武字區游擊大隊長孫銘傳，又叫孫帝國，被批評是一位相當壞的分子，在家鄉義和村有很大的勢力，掌握游擊隊許多槍枝，群眾稱其武字區的皇帝，戲稱「帝國主義」。孫與一些成員反對省委的領導，抗拒上層的命令，當然也不願意繳械。特委當時決議要以反革命分子之名逮捕孫，但黃子文、黃子祥等在地幹部卻以孫在群眾間有威信，遲遲不願動作，甚至連省委派來的幹部高維翰對此事也有所猶豫。[58]雖不清楚孫帝國最後的下場如何，不過黃子文等人對孫帝國的態度，不禁讓人回想起黃子文在 1930 年渭北游擊戰爭中對待隊伍中的土匪分子的妥協態度，

56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二）》，甲冊 5，頁 300。

57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Ｏ年——一九三一年》，甲冊 3，頁 531。

58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二年（二）》，甲冊 5，頁 268、283-299。

再次突顯了陝西組織強烈的地方性格，以致杜衡等省委領導不容易貫徹上層路線與加強省委對地方的支配。

在漢中地區甚至還爲了肅反發生了一件「反革命」慘案。前述西鄉縣黨員陳淺倫在 1932 年回鄉聯絡「神團」，組建成立了紅二十九軍。但這些「神團」與中共僅止於感情上的聯繫，即使在地出身的中共成員也難以控制他們。據後來的調查，最初與中共合作的「神團」有 4 團，後來只剩下張方正領導的 1 團，其餘都離開了。1932 年底省委巡視員李艮到漢中地區工作，擔任二十九軍政委；到達後即以反富農鬥爭爲由，主張立即解決張方正。但漢中地區的地方幹部也像前述的渭北特委黃子文般，因爲張方正在地方群眾中有影響力，持反對意見。後來張方正即在 1933 年 4 月叛變，逮捕殺害了李艮、陳淺倫等重要黨政軍領導；此即「馬兒岩事變」。[59]

實際上，就連向來堅持上層路線的陝西省委書記杜衡，最後也不得不與地方妥協。杜衡如前述原本就與陝甘邊區的隊伍有路線上的紛歧，1932 年 12 月擔任紅二十六軍政委後，甚至以右傾機會主義之名義，將謝子長、劉志丹等人自部隊開除，並要謝立即赴中共中央受訓。可是在部隊的要求下，劉志丹得以繼續留任。事實上，杜本人只是個光桿領袖，沒有劉志丹等地方幹部的協助，幾乎無能爲力。後來杜衡即致函省委承認，對二十六軍的工作「只靠我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在軍事上完全不懂得」，某次的作戰失利更降低了杜在部隊中的威信，因此部隊的領導事實上還是依賴擔任參謀長的劉志丹。[60]

像杜衡般的外來幹部形單影隻，在地方幹部的包圍下，不僅很難堅持自身的立場，兼之缺乏實際工作經驗與不了解地方，如此就不可避免犯下各種或左或右的錯誤。如當時在杜衡擔任政委下的紅二十六軍後來又吸收了幾支土匪，但後者只是利用紅軍的名義到處勒索群眾、姦淫擄掠，這正是過去杜衡領導的

59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三年四月——一九三六年》，甲冊 7，頁 250-252。

60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三年一至三月》，甲冊 6，頁 88-89、143。

省委所反對的。又，當時紅二十六軍面對圍剿時，杜衡等外來幹部也顯得左支右絀，不知所措。如 1933 年 4 月時，杜衡等人在面對國軍圍剿時一度主張撤往陝北，被省委批評是逃跑主義路線，這也是過去杜衡指摘謝子長、劉志丹等人的罪名。6 月杜衡、高維翰、汪鋒等外來幹部，不經省委允許就帶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地區，結果遭到國軍的圍剿，潰散傷亡慘重，士兵因此怨恨杜、高、王等外來幹部；杜等人則是離開部隊，回到了省委。[61]至 7 月杜衡與省委書記袁岳棟等人在西安被捕後叛變，陝西的革命也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八、結　論

本文首先證明了從組織史的新視角與方法來研究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革命史的可行性。透過組織史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共組織在陝西省的建立與發展，自始以來即表現出強烈的在地性格。其具體表現，如陝西組織一開始就是以在地出身的成員爲主，透過既存的關係與網絡或地方的慣習、傳統等從事革命活動與發展組織。又如陝西組織始終缺乏工人或工運出身的幹部，卻有不少具有軍事經驗的幹部，此一現象也反映了陝西缺乏現代化產業，以及陝西社會的動盪與軍事化程度較高等事實。

這些在地的性格雖然有助於組織的維繫與發展，卻也局限了組織進一步的向外擴展；陝北的組織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缺乏上層的領導與外力的刺激，陝北組織始終局限在綏德周圍各縣，既沒有發動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組織本身也是靠成員個人的關係維繫，以致鬆散且缺乏活力。再如 1932 年後的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九軍，都可以發現既存的關係網絡在這些軍隊的結成上發揮很大的作用，但也阻礙了省委對軍隊正規化的改造，甚至還引起軍隊成員的叛變。

所以，陝西組織還需要上層的領導與外力的幫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北伐時期陝西組織爲了聲援國民軍，同時也是在後者的掩護下，加上中共中央的督

---

61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三年四月——一九三六年》，甲冊 7，頁 242-250。

導、援助，陝西組織在短時間內成長了二至三倍。在國共分裂以後，雖然外力對於陝西組織的影響不如河北等其他北方地區，但是如果沒有中共中央的督促，渭華等地恐怕也不會發生暴動；1929 年以後的陝西省委若是沒有中共中央的援助，恐怕也難以為繼。1931 年以後關中、漢中地區組織的復甦及陝甘邊區、渭北蘇區的建立，均與陝甘邊游擊隊、被中共滲透的楊虎城隊伍配合，還有中共中央和陝西省委的路線與政策，都有密切的關係。

外來的力量雖然有助於組織向外的擴展，但是對既存的組織也可能造成相當的衝擊。這樣的衝擊有時是積極的，如國共分裂以來中共中央即不斷要求各地組織進行正規化的改造，這些改革有助於糾正過度依賴少數個人關係與網絡建立發展組織所帶來的局限性；再如陝西省委在與陝甘邊區隊伍接觸以來，即致力於肅清隊伍內部的土匪等不良成分。但有時這樣的衝擊是消極且脫離實際的，甚至會斲傷底層的組織與活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 1932 年被派到紅二十六軍擔任政委的省委書記杜衡，不了解實際狀況，以強硬的手段領導軍隊，最後導致軍隊遭到極大的損失，引致地方幹部與士兵對上層與外來幹部怨聲載道。

然而，整體說來，本文所討論的時期內，外來力量對陝西組織的影響遠不如地方因素。如前所述，當時南方各大蘇區大張旗鼓地發動肅反運動，殺了許多組織內部被認為成分不好的分子，同時期的陝西省委想要整肅不好的地方幹部時，卻礙於地方幹部與群眾的阻擋與不滿，乃至於引爆如馬兒岩事件的叛變。所以造成此一差別，背後一個重要原因是：南方各蘇區在推動肅反時有正規紅軍當後盾，北方地區外來幹部卻是形單影隻，反被地方所包圍。但是，這也預示了在 1934 年後，隨著外來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的湧入陝西，外來幹部掌握陝西組織的主導權後，內部將再掀起一場改造的風暴。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0。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冊 1-7（1924-1936）、乙冊 1（1925-1936），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1-1994。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卷 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卷 4、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2002。

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 1922-198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漢中地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陝南特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

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陝西省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二、專著

康民、秦生，《西北高原起春雷——西北五四運動與大革命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陳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劉鳳梅、王志厚，《謝子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

Selden, Mark.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三、論文及專文

Huang, Philip C. C. "The Jiangxi Period: A Comment o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In Philip C. C. Huang, Lynda Schaefer Bell, and Kathy Lemons Walker, eds.,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 1927-1934*.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劉景范，〈「三嘉塬事件」的眞相〉，「西北革命歷史網」，http://www.htqly.org/detail.aspx?Id=1141。（2016 年 8 月 15 日檢索）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1924-1933: An Investigation into Organizational History

Chen Yao-huang*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period was one of the main concerns of historians during the Cold War. Conflicts between Mao Tse-tung and what was called the three left deviation lines fascinated many historians at that time. After the fading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historians gradually lost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is period. Can we rediscover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period through a new perspective, and in addition excavate unknown historical fac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n Shaanxi province through a new perspective, that of organizational history.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al history, Shaanxi, agrarian revolution, three left deviation line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